

目的地台灣！

——日本殖民時期旅行書寫中的 台灣建構

阮斐娜

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東亞系副教授

吳佩珍 譯

東吳大學日文系助理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中文摘要

過去十年中，由於後殖民與全球化的研究注入活力，對旅遊研究的興趣亦開始振興蓬勃。近年的研究著重於全球化與民族主義之衝突；種族與實相（authenticity）之差距；性別與殖民空間之間的曖昧關係等議題。其主要貢獻即於揭露強權旅行者與弱勢本國者之間不平衡的種族對立的意涵。此類研究強調從殖民主義或新殖民主義的觀點來檢視人類與物質文明的關係，由人口流動、殖民冒險、族群離散（diaspora）、觀光旅遊等視角來探索強弱利權變動的力學構造。換言之，從後殖民理論的空間政治及愉悅的問題意識來看，歷史古蹟巡禮的大旅行或個人性質的私人逗留，都不能視為單純無害的行為。

日本殖民在塑造東亞現代性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日本現代化（即西化）過程，透過日本帝國意圖的篩選，曲折連結了一個從大連、首爾、東京、上海、台北，更連接英國殖民的香港，法屬的西貢，形成一個殖民都會文化城市（colonial cosmopolitan）的大連環。透過這些殖民都會的互動，可了解殖民現代性的形成、流通、轉化的過程。本文研究從十九世紀末的前殖民到二十世紀中殖民期間，台灣與日本之間的文化流動的文學表象。探討日本人戰前／戰後對台灣的觀點如何發展於台灣多文體的旅行書寫與大眾化的推理小說上，並試評美麗的台灣景色如何與大帝國意識型態相衡。

關鍵詞：殖民遭遇、流動性、離散、空間政治化、殖民都會主義

Destination Taiwan!

The Construction of Taiwan through Japa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s

Author: Faye Yuan Kleema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University of Colorado, U.S.A.

Translator: Wu Pei-Che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apanese Language & Culture, Soochow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chi University

Abstract

During the past decade interest in tourism studies has been rekindled, energized by research into areas such as postcolonial studies and global studies. Recent studies highlight conflicts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ism, ethnicities and authenticities, as well as gender and colonial space, and reveal the eth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asymmetrical power dynamic of the tourist's gaze and the native. This body of new research places the movement of human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colonial and now, neocolonial environments, exploring mobility, diaspora, and tourism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colonial enterprise. In light of the politicization of space and the problematization of pleasure, neither the grand tour of monuments nor the private side trip of a personal nature can be viewed naively as just a simple jaunt.

Japanese colonialism played a major role in shaping East Asian modernity.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i.e. Westernization), filtered through Japanese imperial intentions, zigzagged through the linkage of cosmopolitan cities from Dalian, Seoul, Tokyo, Shanghai, Taipei, to British colonial Hong Kong.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se colonial cosmopolitan cities, one can understand the dynamic of the circulation, assimil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 modernity mediated by colonial power.

This paper looks at the Japanese literary constructions of Taiwan from the late 19th century to the postwar period by delving into various genres of travel writing and the popular mystery novel in Taiwan. Using materials such as Tokugawa hyōryūki 漂流記, colonial narratives, and the postcolonial detective genre, the paper looks at the Japanese constructions of Taiwan from the late 19th century to the postwar period. It assesses how the image of Taiwan was appropriated to suit the larger ideological landscape of the empire.

KEY WORDS : colonial encounter, mobility, diaspora, politicization of space, colonial cosmopolitanism

目的地台灣！

——日本殖民時期旅行書寫中的台灣建構

一、導論：帝國，邂逅以及（後）殖民旅行理論

過去十年中，由於後殖民（postcolonial）與全球化的研究注入活力，旅行研究的興趣開始振興蓬勃。最近的研究則著重在全球化與民族主義、種族與實像（authenticities）、性別與殖民空間之間的衝突；以及揭露不平衡的強權旅行者與弱勢本國者之間對種族的意涵。（Blunt and Gillian, 1994; Smith and Duffy, 2003; Hall and Tucker, 2004; Hooper and Youngs, 2004; Siegel 2002, 2004）這個新的研究主體指出人類與物質文化的變動，內文更提及殖民時期與現代，新殖民主義的環境，社會流動的探索，族群的離散（Diaspora）以及充滿殖民冒險精神的旅行者。從空間政治及愉悅的問題意識來看，歷史古蹟的大旅行或個人性質的私人旅行，都不能天真地視為一種簡單的短途旅遊。

日本殖民在塑造東亞現代性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日本現代化（即西化）過程，透過日本帝國意圖的篩選，曲折連結了都會城市，從大連、首爾、東京、上海、台北以至英國殖民的香港。所造成的現代性流通、同化與轉化，是我目前長期計畫所關注的部分。這篇致力於上述議題的論文，側重於研究台灣與日本之間的文化流動，明確地表達從前殖民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殖民期間，日本人如何看待台灣。這是啟發自 Emma Jinhua Deng 廣泛而具開創性的研究。此項研究著重於從十七世紀起中國人對台灣的看法的變化。而我將採取相同方式進行研究，研究日本人從十九世紀後期到戰後對台灣的觀點，這些觀點如何發展於台灣多文體的旅行書寫與大眾化的推理小說上，追尋台灣從「蠻荒之島」

到日本「治權領土」的軌跡。這篇論文同時關注日本人到台灣來的旅程中所書寫的文學作品與視覺展現，並且試著評論這些美麗的台灣景色如何與更大的帝國意識型態相比擬。

從十九世紀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為止，身為亞洲殖民勢力之一的日本對其殖民地屬國以及地貌無可避免地投以東方主義式的凝視。藤森清的旅行研究以及旅行對於十九世紀轉換時期的日本知識分子在現代認同的形成上所產生的強烈影響，解明了日本人對自己環境認知的兩個基本轉變¹。相當於英國人（再）發現希臘以及義大利的「大旅行」傳統的初期實際旅行經驗（是高級官僚以及菁英的專有特權），喚醒日本人的懷舊感覺，並引導他們以外國人的新觀點重新檢視他們自己的地理以及文化景觀，非常類似日本在一九七〇年代成功的「發現日本」活動，這是日本史上第一次為中產階級提供了休閒時間的大量消費。藤森清的論點主要集中於國內旅行，但他也提及經常性地組織殖民地旅行（滿洲、韓國以及台灣）以及這些旅行與現代國家意識形成的密切關係。透過田山花袋以及永井荷風的文學作品，藤森清有效地證明了在世紀轉換期，觀光旅行是如何促進多樣的文化二元性產生，例如城市／鄉村，自然／人類，特別是核心／邊陲。²

在接下來的章節，我將以出版品系列以及視覺文本追溯從現代化早期、殖民時期直到戰後日本對台灣概念的建構以及轉變。德川晚期的調查文獻〈漂流記〉，記錄幕府鎖國政策時期，船員不慎漂流至日本以外地區的故事，在明治少年文學中復活喚起並改編成擴張的帝國野心。甲午戰爭前後，報刊雜誌等大眾媒體所描述的台灣，大多有意強調日本的文明使命。殖民地時期的作品就分殊化了。西川滿的台灣地誌閱讀（《華麗島頌歌》），及其歷史空間建構（〈採硫記〉與《台灣縱貫鐵路》）截然迥異於北原白秋、佐多稻子、野上彌生子，這些以正式貴賓的身分拜訪過台灣總督等作家的作品。本地作家呂赫若，在短篇小說〈玉蘭花〉中描寫一個日本旅居者。受歡迎的戰後推理小說家日影丈吉以自身經驗，

¹ 藤森清，〈明治三十五年・ツーリズムの想像力〉，小森陽一編，《メディア・表象・イデオロギー》（東京：小澤書店，1998年）。

² 同上註，頁53-68。

記錄從軍時駐紮台灣的情況，他的鬼氣故事裡將台灣地貌作了幻想與真實的混合，如此便提供了一種非帝國（如果不是反帝國）的觀點。實際旅行的記錄，例如日本學生到殖民地的戰場與神社致敬，或昭和天皇到台灣的皇室訪問，這些文體將用來比較對照呈現與再現的落差。

援用大衛·史寶（David Spurr）對報章雜誌、旅行書寫以及帝國統治探索的殖民地論述，本論文將由前殖民地時期的概念形成，以及殖民地全盛期到後殖民書寫來檢視日本的台灣建構。在《帝國的修辭學》（1993）中，史寶將殖民地論述以及研究分類為十一個基本修辭要素，以及研究他們如何分布。雖然他主要以十九到二十世紀的英國、法國以及美國的書寫為例，但他研究的啟示可援用於其他不同殖民地研究。他的分類目錄從聽似科學性中立的分類，像自然化以及援用，到負面詞類例如墮落、否定、監視，到更積極涉入美學的，像是理想化、美化、情慾化以及決斷。

大多的殖民地旅行記述皆能適用於一個以上史寶的修辭方式。對照殖民地征服早期鼓吹啟蒙任務且具有前殖民地時期的價值中立描寫論述，受限於意識型態的殖民地全盛期，以及最後的後殖民時期中的後殖民謎團解讀，本論文意圖呈現日本對台灣論述發展過程更完整的圖騰。

二、流行的想像與明治時期的現代化

日本南方海島的台灣在日本南方想像的連結中佔有重要地位。在先前有關日本占領台灣以及南洋期間（1895～1945）的殖民文化狀況研究當中，我已經檢視了日本的南方文學建構以及殖民地想像。³主要根據矢野暢的南洋（南方）研究，南方論述不同於之後的北方殖民論述（主要以滿洲以及蒙古為中心）。殖民統治性質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的變化也出現在兩個殖民地的文學以及文化再現。南方憧憬以及之後的北方幻想滲透了日本的殖民想像。兩種想像相互謳歌而且二者的對照亦幫助我們理解帝國的概念如何不同地在二地形成。

³ Faye Kleeman, *Under an Imperial Sun Japanese Colonial Literature of Taiwan and the South*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日本蔚為風潮的南方想像，起源自世紀的轉換期風靡了男性讀者的流行海洋小說。冒險小說（海洋小說），例如押川春浪（1876～1914）所創作的一系列流行英雄故事，包括了具有民族意識而且反西洋的《海島冒險奇譚：海底軍艦》（1900），或是《英雄小說：新日本島》（1906），在少年讀者當中大大地流行⁴。包括同時期受到男性讀者歡迎的政治小說，這些書寫在促進具有世界性但同時也有民族意識觀點的流行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就某個意義上，這個地理的文學，在有關測量員，地理學家以及其他更多精采的敘事者故事的型態中，讓他們在想像中，超越國界。例如，在奠定日本散文特徵的文言一致運動中領導有功的山田美妙，對於菲律賓獨立運動也非常熱中。他在小說《菲律賓獨立戰話：阿奇納多》所描繪的英雄愛米若·阿奇納多⁵，是對這曾經掙扎於西班牙和美國的殖民勢力下的島國，其獨立的熱切渴求。與外面世界的連結逐漸擴張，同時，因快速發展而失去方向性的現代化生活襲來，促使知名的日本民俗學家柳田國男如此評論：

海的景色在明治期後有了急劇的變化。在深山中也因鐵路以及礦山的開發或林業繁盛而有了改變。海也因此而變得更有生氣。全體來看，活動頻繁的多，停滯不前的少⁶。

自十九世紀末期，這些海洋小說將日本大眾的南進想像定錨於無限廣大以及潛力無窮的大海——通往充滿寶藏的未知土地的入口，海盜出沒，美國以及英國的戰艦占據了放眼所及處的地平線。而日本日漸擴增的海軍，想像著或許將能夠擠身這群勢力。這些日本殖民風景的想像反映了深植於日本近代化過程的幻

⁴ 一艘由法國建造，負有日本政府任務的戰艦於 1886 年失蹤於台灣海峽。押川根據這個真實事件所編織的一系列幻想小說，類似西洋的《金銀島》、《基督山恩仇記》或者是中國的英雄浪漫小說《水滸傳》。押川具國際視點故事鋪陳雖然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觀點，但仍然迥異於日俄戰爭以及太平洋戰爭備戰階段主張軍國主義以及英雄崇拜的文學作品，他們強調遭西方帝國勢力——例如英美，統治下的弱小國家的聯盟。參考北上次郎，《冒險小說：近代ヒーロー像一〇〇年の変遷》（東京：早川書房，1993 年），頁 335-341。

⁵ 導演衣笠貞之助以及劇作家小國英雄曾計畫於 1942 年製作關於反殖民地英雄阿奇納多以及荷西·黎薩的電影。在劇本當中，原為中國人子孫的黎薩的母親，被認定為日本人，以強調與日本的關係以及對美的共同作戰的連帶關係。見 Peter B. High，《帝国の銀幕：十五年戦争と日本映画》（名古屋市：名古屋大學出版社，1995 年），頁 398。

⁶ 柳田國男，《明治大正史·世相篇》（東京：平凡社，1967 年），頁 107。

想以及——與西方令人屈辱，去勢性的邂逅，緊接著日本被迫開國以及一八〇〇年代中期以後，西方（先有美國後有俄國和法國）強加於日本的不平等條約——後的反應。基於這挫敗遺產的事實，日本新取得的工業技術以及對兩個古老帝國——一八九五年對中國以及一九〇四年對俄國——的勝利，不僅激起政府還有一般大眾對殖民地擴張的新熱潮。

通常對於明治時期現代化的指標多會指向新興納入的政治機關，成長中的軍事勢力，商業資本主義以及大眾教育綱領，但是日本與外面世界的關係是另一個與前近代封建社會有清楚斷裂的區域。歷經幕府兩個半世紀的鎖國政策，明治政府已注意到日本在東亞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並急於展現日本現代國家的形象——那屬於文明世界一部分，即使是尚未完全取得平等的一員。全球性的展望符合這個政治課題，而流行的媒體也助長這個新的世界觀。快速的西化過程不僅普遍有著官方支持，其影響力也伸展至日常生活的流行——從食物、時尚到個人想像力以及娛樂。流行的口號，例如「立身出世」、「大陸雄飛」鼓舞孩童，特別是少年離鄉背井甚至穿越國界的雄心壯志。或者如美國傳教士／教師·克拉克將這口號引用至他廣為人知對日本青年的宣言：「男孩們，要胸懷大志！」⁷。主要鼓勵日本人遷移至當時邊境的北海道，為自己創造新世界。當時許多流行小說以年輕的男性讀者為主，鼓勵他們大膽地探索冒險，即使僅止於他們想像中。例如名為《少年立志傳》、《一讀奮起少年龜鑑》以及《和漢百童傳》成為暢銷書，而迎合少年的雜誌也非常流行。

現代化意味著獨立以及移動。現代的人權運動，例如一八七〇年代與一八八〇年代的民權運動，創造了現代主體性，也就是主張他或她的意志與封建家庭制度切割，以及不受出生地束縛的個人。離鄉背井以及任由命運引導，才能獲得財富以及名聲。脫離封建歷史的解放，不僅與發展移動手段（也就是鐵路、

⁷ 威廉·史密斯·克拉克博士（William Smith Clark, 1862~1886）於1876年創立了札幌農學校（今天的北海道大學），是日本第一個現代化大學，以及現代化、科學以及美國式的農業中心。他的雕像，手指西方，仍然矗立在山丘高處鳥瞰全市，已經成為北海道最著名的觀光景點之一。這座雕像也顯示明治初期為殖民區域的北海道，其殖民性質以及邊境精神。此外，也為這座校園增添榮耀的是著名的殖民學學者新渡戶稻造，他是農學校的畢業生。

蒸氣船等)的新興工業同時出現，也由於民族意識以及擴張主義的帝國論述小說的形式支撐而能屹立不搖。這促使雄心壯志者不僅在日本本土，也在日本外面的新世界到處活動。

三、意外的旅行：明治初期的海洋書寫以及發現台灣

在這樣社會／文化文脈中，我們將檢視明治期海洋書寫當中的《日本漂流譚》(1892)。由當時流行的少年雜誌《小國民》編輯石井民司所編撰創作，學齡社出版。這個系列在其前言已經闡明目的。在自序中，石井民司回想他曾經見過一位碧眼男孩，從容不迫嫺熟地操縱船隻。這小男孩告訴他，自己來自英國，而這國家的海國歷史已經很長久，他們「在萬哩以外最罕有的地域尋求國家利益，派遣軍隊至他們所未期的異國」。他做下結論：這便是為何國家強盛富有的原因。對照日本的狀況，石井感歎日本成年男子一踏上船便暈眩，臉色發白，他們連一個英國孩童都比不上。石井評論道：過去憑藉單桅船隻，學生(學問僧)航行至中國，而他們的祖先曾經征服了三韓以及北方的靺鞨。他責難德川幕府嚴禁出國而使得日本國民航行探險海外的天性受壓抑，而也因為這樣的挫折，促使他就這個主題編撰這套叢書。這叢書收入德川時期漁夫們的口述故事，也是明治時期教育當代孩童海事的教育目標之一。

這系列當中第一本書是日本與台灣邂逅最早的書寫之一，題名為〈志摩人，漂流至台灣後搭乘清國船隻返回故鄉〉⁸。這份書寫，記錄了一七五七年(寶曆七年，1751~1764)，六名志摩國布施村水手的冒險譚。他們將貨物裝上船由大阪出發前往志摩的大尾崎港時，突如其來的強烈西風吹來，使他們失去方向。他們在海上漫無目地的漂流了幾個月後(確實日期是一百五十六天)，忍受無數苦難，看著兩個夥伴因乾渴而死，有一天終於漂流到一風景類似日本的異國土地。當四個水手第一次上岸時，他們遇見了八個異樣裝扮的男子，持有矛、弓箭以及槍枝。這八個人奪去他們的衣物強迫他們穿上毛皮，沒收他們的行李，

⁸ 〈志摩人，漂流至台灣後搭乘清國船隻返回故鄉〉，參考石井民司，《日本漂流譚》(東京：學齡社，1892年)，頁67-93。

分解他們的船隻，拿走他們所有的鐵釘並將他們監禁到製鹽的小屋。後來才知這八人是盜賊。他們最後被村莊的長者所逮捕——他們帶來兩百人的農民來解救日本漁民。

從此開始，故事有了轉變。由暗沉而痛苦的語調轉變為較為愉快的氛圍，同時觀察著當地的盛情款待的狀況，自然，景觀，習慣以及他們與原住民許多商業交易。

村中長老出現，他們試圖問四位漁民一些問題，但是卻一點也無法理解他們的語言。日本人用草書書寫，他們一樣無法解讀，即使再加上假名，他們還是無法理解。之後，用楷書書寫，結果一樣。最後，我們放棄了，大家一起開懷大笑。(頁 72)

四個人接下來被板子抬著（類似日本村莊祭典時所用的神轎）並巡迴了許多村莊。所到之處，有米酒以及栗子糰子款待他們，村民沿路大排長龍來見他們。日本人抱怨強烈的酒嘗起來甜中帶有些許酸味，而且食物氣味難聞難以下嚥。

食物有惡臭所以難以入口。但如果我們如果不吃些東西，是極為失禮的。我們四人分食了一個饅頭，剩下者便絲毫不動，而主人們放聲大笑。(頁 74-75)

之後四個人便被帶往國姓爺首府漂亮的黃金宮殿晉見三位高官。他們目睹了對罪犯卑下（要犯人爬過他們的胯下）而嚴酷，最後處決的待遇。他們被安置於一身分高貴者的住處並停留首府約有四十天。

我們被安置的房間四周裝飾著金欄，寢床鋪滿了毛皮以及毛毯。飲食宛如在日本一般，每日或五菜一湯或七菜二湯。符合我們口味。我們每天三次被待以最好的米酒——類似日本的諸白酒⁹。此外，我們每天被賜與金錢以及米一石六斗。錢看來類似寬永通寶。我們每天有三次熱水可用。我們停留了大約四十天，無所匱乏。每日都有為了來見我們這些異鄉人的訪客。公子與貴

⁹ 諸白是德川時期以最上等的白米加上掛米（譯者註：一種製作清酒的醪所使用的米）以及麴所製成。也用來指最上等的酒。

夫人絡繹來訪而我們使得他們大笑。有些女客帶著孩子，他們走向我們丟擲糕糖彷彿我們是專供娛樂所豢養的猴子與鸚鵡。雖然我們覺得不愉快，但是來自異地的漂流者，命運操之在人，只有忍受屈辱度日別無他法。

這在大多數敘述表面的故事當中是非常罕見的過程，當旅行者斡旋於他們自己與他們的俘虜者，它暴露了更多的反照。同伴當中一人患病，雖然當地居民三十人日以繼夜地看護，他仍然死去了。他們精心為他舉行葬禮，有五十名僧侶為他誦經，而數千的民眾參加了葬禮的行列。葬禮之後，他們被護送出了台灣到達清國的福州。之後，有八十個送行人以及三名醫師的陪同，他們開始出發到南京。他們在中國大陸的旅行是另一種文化衝擊；都市更加繁忙，城堡更加廣大，所受到的待遇甚至比在台灣好：他們收到了許多豪華的禮物以及銀子。被款待以最好的海產（雖然旅行者記錄著他們所吃的多半是河魚，例如鯉魚、鯽魚以及少數海魚），他們增加了體重並且渴望較儉樸的食物，像是他們在家常吃的麵以及米麥。經過多日經常遲至凌晨的送行宴會，滿載珍貴禮物以及許多送行者的眼淚，旅行者終於踏上返鄉的旅途。返國之後，他們被地方政府盤問，雖然被嚴厲禁止再次航海，但與家人再度團聚，此後過著快樂的生活。

比起之後殖民地時期的旅行書寫，令人驚訝地，《日本漂流記》並不具有任何殖民地課題以及民族意識情感。並沒有啟蒙任務或是擴張領土野心的證據，而是顯示對異國價值中立描寫的結果。在《日本漂流記》的台灣表象首先對十八世紀中期的日本人，之後為十九世紀的讀者，呈現人與人之間真誠的相遇——因為主人的好意以及收容，即使語言障礙以及習慣不同。敘事者（們）充滿了好奇心，有時敬畏於當地居民的熱情款待以及好意，讚賞對犯罪者快速執行的正義，同時卻又思鄉。這是一份意外的過客對於漂流所至的領域並不具備概念或是預備常識的記錄。他們遭遇了三個層次的文明：第一，是較為原始的原住民部落，之後，則是鄭成功的地方流亡政權，最後則是富裕繁榮的滿清社會。有許多時候旅行者對他們所遭遇的人們或是社會顯示厭惡或敬畏，有歡樂、思鄉、悲傷以及好意。描寫的外國大多沒有太多的批判。但這雙方平等的地位很快便被轉換成為殖民地君主與臣民的關係。

四、十九世紀後期日本的台灣戰略以及當代的概念形成

日本以及台灣第一次正式的接觸發生在一八七四年十一月，稱之為「牡丹社事件」。當六十六名琉球漁民因船難在台灣上岸，其中五十五名為原住民所俘虜或斬首。新成立的政府視此為宣稱琉球所有權的最好機會——琉球為一獨立島國，在中日歷史上的地位曖昧。日本也將此事件視為對台灣擴展其勢力的開端。事件發生一年之後，正在中國的留學生水野遵以及後來成為第一任台灣總督的樺山資紀被秘密派遣至台灣以偵查狀況。

日本任命副島種臣為特使與清國交涉「牡丹社事件」。清國以台灣原住民為「化外之民」的理由拒絕負起責任，日本趁此機會於一八七四年五月進攻台灣，宣稱此次行動為「自力救濟的義舉」。日本軍隊駐留台灣約六個月迫使清國重回談判桌。¹⁰

牡丹社事件十年之後，清廷與法國為了越南的利益衝突，雙方捲入戰爭。當法國封鎖台灣的港口以及攻擊清國在島上的軍隊，清廷被迫重新評估台灣島的戰略重要性，以及開始為時已晚的參與以及發展政策。在事件之前，清國一致的意見是統治台灣的負擔是大於殖民台灣所得的利益的¹¹。在此時期歷史人物例如劉銘傳在台灣留下了他們的痕跡。身為福建以及台灣巡撫，劉銘傳是第一個提議台灣應與福建分治，獨立為省，並成為台灣第一任巡撫。他也被認為建立起這塊島嶼的統治系統，在殖民地時期大多為日本所援用，之後則為國民政府所採用。¹²隨著台灣在東亞地理區域戰略定位，以及日本殖民野心的興起，台灣論述也開始出現在流行的媒體。福澤諭吉在《文明論之概略》中提出比較文明的相對性論述，主張將歷史時間以及環境納入考量。例如中國、土耳其以及日本，如果與一些非洲以及澳洲的殖民地相比，是比較文明的。而歐洲諸國（以及日本）則是當時最文明的。這套野蠻、半開以及文明的漸進式系統，

¹⁰ 兩國於1874年10月31日簽署和平條約，清廷付給日本慰問金黃金10000兩。在條約中，日本軍隊對台灣的占領雖被否決，但琉球的統治權已在暗中轉讓日本。

¹¹ 參照 Deng, Emma Jinhua,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 (Cambridge: Harvard Asia Center, 2004: 81)。

¹² 劉將省的治理制定為三府，十一縣三廳以及一個直隸州。

鞏固了日本的現代概觀，而福澤諭吉之後的《脫亞論》只不過是同一個主題上更進一步的方法論詳述。經常提及的，是他早期對帝國主義的支持，例如支持中日戰爭。福澤深信亞洲的現代化能夠臻至完備，是靠軍事優勢。

雖然當時大部分的西方媒體仍然認為日本是「未開發國家」，但是日本精英卻樂意接受啟蒙他們亞洲同儕的任務，並將之視為天命之一。(小森 2001: 15)。主張自己的「文明」地位的方法之一，便是創造邊緣化的「原始」。日本的殖民主義被發現於日本式的東方主義——是他新近才取得的西方現代化優越感，他開始對亞洲鄰國產生敵意。這種結合了同化與排外的二元論述策略，在日本的殖民主義中完全呈現。個人以及現代主體性的出現，快速地被編入富國強兵以及脫亞入歐的國家（以及帝國）政策。¹³

台灣是半開化之地（如果不是完全蠻荒），需要被馴服的概念在此時開始生根。¹⁴當時流行的報紙雜誌對於一八七四年侵略台灣（台灣出兵，牡丹社事件）的報導（包括文字以及圖片）將台灣原住民前景化，他們被稱為「台灣蕃民」，而其命運則操在帝國軍隊的手中（我軍之恩惠）。在日本獲得台灣作為第一個殖民地後，台灣潛藏在帝國邊緣無人之島的形象更加被強化。明治時期，菊池幽芳（1870~1947）的家庭小說《己之罪》（1899）從一八九九年到一九〇〇年在《大阪每日新聞》連載，在當時非常風行。女主人公箕輪環在婚前生下男友的私生子後，決定到台北醫院充當護士以贖己罪。¹⁵相同地，島崎藤村（1871~1943）的《新生》以自然主義風格描寫了作者島崎藤村的情事，以及他過世太太的妹妹懷孕之事。姪女節子之後被送往台灣，以避免作家陷入醜聞。台灣是

¹³ 現代以及主體形成是日本文學龐大的主題。關於現代論述，已經由各種學術領域集中作過探討。從社會、政治史到文學以及文化，例如志怪（Napier, 1996 年），民族學（Ivy, 1995 年），地方信仰（Kawamura Kunimitsu, 1990 年）以及精神錯亂（Matsuyama Iwao, 1993 年）。東／西，現代／前現代的二元構圖滲透了這些批評，而最近的趨勢則避免二元對立構造而探索兩方的複雜以及共犯關係。這個較為概觀以及統合的觀點可見於川村或 Gerald Figal 的研究。例如川村認為地方志怪對於「現代日本」的意識型態以及制度的建構非常重要。而 Gerald Figal 在《文明與怪獸》（1999）中主張志怪（fushigi）是日本近代的歷史構圖形成的核心。

¹⁴ 關於日本對台灣開化任務的進一步探討，參照 Ching, Leo T.S., *Becoming "Japa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158-60).

¹⁵ 參照中根隆行，〈旅するコロニアル・ディスコース〉，天野治幸編，《明治から大正へメディアと文学》（筑波：筑波大學近代文學研究會，2001），頁 134-152。

不幸以及遭受欺凌者所逃亡的偏僻海島，這樣的抽象概念，在一九二〇年代經歷了種種變化。特別是在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實施了加速同化的皇民化運動之後。台灣再度成為大東亞戰爭中戰略地位重要的前線，具有現代軍事要塞的形象，是日本南方邊境的關卡。

五、殖民地全盛期的帝國旅行以及偶然的旅行者

在殖民地全盛期訪問台灣的日本旅行者注意到粗野、原始的原住民族群以及傳統的農耕社會不協調地同時並存。這社會擁有俗麗及充滿異國風情的廟宇以及高度發展的鐵路、地方出版品、流行的娛樂，和有著寬廣的道路以及充滿活力的城市生活——如台北市的現代景觀。即使如此，台灣現代化的象徵仍是它的鐵路系統。類似帶來大量移動人口的快速增加以及催生歐洲現代觀光旅遊的歐洲鐵路系統，台灣的鐵路系統是日本殖民統治的主要成就以及驕傲。劉銘傳在一八九一年以及一八九三年建造了兩段簡易的銜接鐵路（台北到基隆，以及台北到新竹），而日本人在一九〇八年完成了縱貫鐵道¹⁶並於一九一二年成立觀光局以宣傳台灣觀光旅行。

在台作家西川滿（1908～1999）其充滿地方色彩的詩集，例如《媽祖祭》（1935），《鴉片》（1938），《列仙傳》（1939），《台灣風土記》（1940），《華麗島頌歌》（1940），《華麗島民話集》（1942），《華麗島顯風錄》（1935～1936，1981）以及《台灣繪本》（1943），主要以他早期浪漫以及民族誌式的詩情描寫而著名。西川滿對台灣浪漫的地誌性解讀，反映在一系列關於台灣的歷史小說。他部分的歷史小說重複以及虛構既存史誌，例如他援用郁永河為清廷所寫的挖採硫磺的記錄，以及《稗海記遊》寫成《採硫記》¹⁷。此外，像《赤崁記》（1940）企圖主張鄭成功王朝的正當性，以便為太平洋戰爭前夕日本南進的野心背書。西

¹⁶ 縱貫鐵道的完成，被殖民地政府視為是在台灣殖民統治的最初十四年當中最重要成就。關於此項鐵路完成有關的活動以及其後對國內生活的其他方面（貿易，展覽，農業等等）的影響，參照呂紹理，《展示臺灣》（台北：麥田出版社，2005年），頁202-204。

¹⁷ 參照中島利郎、河原功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日本人作家作品集·西川滿》（東京：綠蔭書房，1998年），頁359-436。

川在他的歷史故事中所使用的敘事型態，經常利用前殖民時期的殘餘並依當時殖民地意識型態重新改寫。在他的長篇小說《台灣縱貫鐵道》(1942)中，西川回溯鐵道系統的歷史，創造台灣時間以及空間發展的概要，其被簡約為原政權所建築的鐵道路段以及在殖民地政權下完成的連結。在西川的台灣歷史論述再造中，台灣的現代性被收編成為這個工業技術發達、強而有力的象徵。

鐵路以及其他運輸系統提供人，物資，知識以及情報移動所需基礎構造的硬體。得到這個新的大量運輸動力，使得幾個輔助工業可能興起。而觀光景點的人氣，例如台灣八景¹⁸，則透過流行指數推波助瀾而屹立不動。而選擇的類型則強調當地有著與日本著名景點的相似處(日月潭與琵琶湖)，與日本政治有連結性(祭祀著征台英雄北白川能久親王)，或者工業意義(如糖廠)，以迎合當地以及內地的旅行者。

在她日本的滿州移民研究中，特莎·莫莉司·鈴木指出，神社以及滿洲鐵路是兩種對照性神話學式建構的顯現，前者是殖民主義神話的表象，而後者則是現代國家神話¹⁹。鐵路系統以及神社在日本所有的殖民地到處可見，結合了(被認為是)穩定以及屹立不搖傳統的東方神話，和可往回追溯數千年以及由鐵路所象徵的促進工業現代化的帝國統治。這個帝國神話、現代化以及領土具有正當性的強化，是昭和天皇(當時的太子)在一九二三年第一次巡訪這個殖民地島嶼時。²⁰ 被稱為行幸或行啟的皇族旅行並不是單純的享樂旅遊。²¹ 它結合了統治者巡視領土(國見)的古代例行儀式以及帝國統治權遍及天皇新島嶼的主張。這島嶼以現代工業以及軍事優勢為基礎，將日本國體擴張至台灣。數種命名，例如將數支原住民部族重新命名為高砂族——有典故的吉祥名稱，或者是以令人聯想到內地的名稱重新命名地方自然地域、建築物以及山岳。台

¹⁸ 呂紹理，《展示臺灣》，頁 375-385。

¹⁹ テッサ・モーリス・スズキ，〈植民地思想と移民—豊原の眺望から—〉，吉見俊哉等編，《岩波講座近代日本の文化史第6巻『拡大するモダニティ—1920—30年代』》(東京：岩波書店)，頁 185-213。

²⁰ 關於此次旅行的視覺展示以及再現的更進一步論述，參照 Kleeman (2006)。

²¹ 在日本，「巡幸」指的是天皇出遊，而「行啟」指的則是太后、皇后以及太子或皇太妃。皇太子裕仁當時尚未繼承父親大正天皇的皇位，但是由於大正天皇健康欠佳，已經每日代為執行宮中事務。在當時報導此次旅行的媒體中，兩個名詞交互使用。

灣的第一批國家公園正是將在地景觀巧妙地轉型編入帝國地理身體的證據。台灣在這以父之名的意義環圍之下，被收編進入帝國的象徵秩序當中。

六、內部旅行之謎：動物誌、謎團和呂赫若以及日影丈吉的文學位置

人們為何自內地到殖民地旅行有很多理由。意外之旅的航海者、殖民地統治者、官僚、士兵、皇室旅行，以及新興集結尋求娛樂的中產階級都是這批人潮的一部分，往來本國以及殖民地之間。他們或為公務，或為某種政治課題，或為經濟理由或只是為了享樂。無論他們意識與否，大部分的人，即使不是全部，透過了這個旅程似乎都經歷了某種轉化過程。

本文最後的章節，將脫離典型的旅行書寫，並在稍稍不同的框架中重新探討殖民地旅行的基本問題——權力以及空間關係。在呂赫若的短篇小說〈玉蘭花〉²²（1943）以及日影丈吉的殺人懸疑小說〈內部的真實〉（1959）中，台灣以及具有特別迷幻香味的花朵玉蘭花，成為日本主人公的修辭比喻。呂觸動人心的小說，描寫日本訪客與台灣男孩二者之間形成的親密友誼。這沉穩以及感動人心的故事相當特殊，因為它描寫了日本人以及在地者之間頻繁的個人互動，而那在殖民文學整體當中非常少見。日影丈吉是戰後流行的偵探小說作家，以超然的文體以及具說服力的佈局構思著名，曾以士兵的身分駐台四年（1943～1946）。根據此經驗，他以台灣為舞台寫成兩篇小說以及許多短篇故事，是有關兩個日本士兵以及台灣女性間陰暗而充滿謎團的三角戀愛故事。²³

為了避免殖民主義的直截政治聯想，呂放低了故事的視點，讓我們透過一個幾乎不離母親以及祖母身邊的七歲男孩的眼睛來觀察整個狀況。男孩扮演著對日本人的單純觀察者，沒有評價也沒有先入觀。

²² 最初刊登於《台灣文學》4.1（1943年12月），頁119-131。文本引用自中島利郎以及河原功複刻本，黃英哲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台灣人作家作品集·呂赫若》（東京：綠蔭書房，1999年），頁263-275。

²³ 日影關於台灣的作品，評論家稱之為「台灣系列」（Taiwan mono）包括另一本《應家的人們》，以及短篇故事像是〈眠床鬼〉、〈天仙宮審判日〉、〈消失的家〉以及〈喧鬧的屍體〉。

故事一開始是年長的敘事者看著他童年已經老舊褪色的照片。

我在少年時期與家人一起拍的照片現在仍有二十張左右。所有的照片都已褪色變黃，甚至有的連輪廓都已消失而變得模糊。不過只要看上一眼，便足以喚起我少年時期家中的氣氛。多數的照片都是已過世的祖母，伯母以及母親在有著盆栽以及坐椅的庭園所拍攝。她們穿著五彩鑲邊的上衣和裙子，表情僵硬。照片中，少年的我多半撒嬌似地依偎在祖母或是母親的身旁，雖然祖母或是母親握著我的手，但她們總像自顧不暇似地僵直著脖子瞪著照相機。²⁴

此處凸顯現了現代科技以及地方禁忌的柔性衝突。照片是由這家的日本客人，也是一位攝影師，鈴木善兵衛所拍攝，他與此戶人家同住。雖然他一開始沉默寡言，但男孩很快地與鈴木成為朋友，而兩人在幽靜的鄉間自由漫步，渡過漫長的夏日。當鈴木被病魔襲擊倒下，並沒有西醫可以拯救他，只有透過女巫師以地方儀式做法招魂，才能使他回復健康。

鈴木，是位留長髮的流浪者，他由內地逃脫至殖民地以追求其個人的藝術。在此，他的滿足來自從社會的義務以及期望中得到的暫時解放，以及殷勤招待主人的縱容。當他帶著些許的失落以及悔恨離開台灣時，孩子們從樹蔭間以及薰人欲醉的玉蘭花香氣中目送著他，一如他抵達此地當天一般。

玉蘭花也在日影的懸疑小說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當敘事者尾高敘說一件關於日本士兵離奇死亡的懸疑殺人事件，一開始沉穩而冷靜的語調逐漸變得瘋狂而混亂。謀殺事件發生在一個沒有月亮的夜晚，只有玉蘭花醉人的香味引導調查者進入犯罪現場。由章節的題名如（1）「黑暗與時間狀況」、（2）「關於手槍的數學計算」、（3）以及「實彈計算的觀察」，可得知作者顯然地欲傳達整個調查的科學公正性氛圍。即使如此，隨著故事的進行，謎團並未解決，反而是越來越多的人物似乎涉入嫌疑，同時懷疑死去的士兵自殺的可能性增高。所有涉入謀殺案的似乎都跟當地的女性有關，而它讓敘事者想起了那香味濃郁的

²⁴ 中島利郎以及河原功復刻本，黃英哲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台灣人作家作品集·呂赫若》，頁 263。

花。這案子到故事結束都未解決，它因敘事者尾高士兵死於美軍的空襲而中斷。明顯地，推理的準則並不適用這個事件。對這事件越推理，它便變得更支離破碎，理性的推理帶來更多的謎團。不管是寫於日本帝國末期或是其滅亡不久之後，這些故事與現代理性主義精神旺盛的明治時期論述，是反向而行的。在幾篇隨筆當中，日影提到他自己是如何苦思玉蘭花的日文、英文以及拉丁文的正確的對等字彙。自稱為園藝狂的他遍尋許多百科全書，但卻無法確認他在台灣所看過的品種。深植原生土地土壤中的植物誌以及動物誌，其無可轉譯性正象徵了原住民以及殖民者，和宗主國以及殖民地在認識論以及地理學上的歧異。由於暈眩以致失去方向感的視覺以及慵懶熱帶景觀的誘惑，這個島嶼對這些人而言仍然是未知領域。雖然兩名在地者的定位有著實體性，但特有的原生植物，玉蘭花的謎團般的姿態，對殖民主義而言則是糾纏不去的鬼魂。台灣只是一個論述的空間，在此過客可以得到安寧，無論是療癒他的挫折（如鈴木）或者對其整體罪行贖罪（如尾高）。

七、結論

在《帝國之眼》中，瑪莉·露易思·派特對旅行書寫以及帝國的指標性研究中，我們了解到歐洲人的旅行書創造了歐洲帝國主義的境內主體。檢證從十八世紀到保羅·色洛斯的旅行記錄，派特指出宗主國的公共讀者群參與擴張的企業並且不只在物質受惠，也獲得想像（或是實際經驗）外面世界的可能性。換言之，旅行書寫為宗主國的讀者群創造了「其他的世界」。

無可置疑的，殖民以及探險論述在帝國的意識型態操作中，扮演了具有意義的角色。孰善孰惡，這些是透過帝國之眼台灣如何再現的例子。透過閱讀無邪讚美和傲慢的潦草記錄，以及比較浮誇和真實之間，台灣就在此被發現。

